

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长城无人区”

陈 平

1942年和1943年，我是在冀热辽地区长城线上“无人区”里度过的。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残暴罪行。1942年8月上旬，日本侵华主要战犯冈村宁次，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并亲自做了布置后，日寇出动重兵对冀东进行连续疯狂“扫荡”，强征几十万民工沿密云、平谷、蓟县、遵化、迁安等山区边缘挖成封锁沟，将长城线上直至封锁沟以内的村庄全部烧光，将群众全部赶走。根据敌人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1.57万多间房屋被烧毁，64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毁为焦土，即成为所谓“无住禁作地带”，近10万居民被赶出了家园。

伪满洲国方面，由关东军负责实施。从长白山一带调来专门搞“无人区”的讨伐大队，在承德、兴隆、滦平、平泉、青龙、凌源等县，制造更大规模的“无人区”。其办法与关内略有不同，不是把群众全部赶走，而是通过连续的疯狂“扫荡”，实行集家并村，将山地的群众赶到“部落”村。

“无人区”虽然出现在冀热辽局部地区，可是日本侵略者所以要在长城线上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却是出于整个侵略战争的战略决策的考虑。绝不是一个时期战役的需要或某些战斗的刺激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以，进攻扫荡之疯狂，摧残手段之凶狠毒辣，都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是那样旷日持久地坚持搞了数年之久，直到其最后覆亡的前夕，仍然不遗余力地在这一带

垂死挣扎着。

日本侵略者这种“确保满洲”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是准备对苏作战，而更现实更直接的战略目的，还是把满洲从中国版图中彻底割裂出去，实现永久占领，特别是要坚决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向东北挺进。所以，在长城线上划定其所谓“大满洲国西南国境线”，并且制造纵深千里的“无人区”封锁线，从而这一带也就成了最敏感的战略争夺地带。

一、关于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时限和地域范围

过去由于资料不完备，对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时限、地域范围等一些基本情况搞不清楚，所以，在一些发表过的文章中其说不一。根据我掌握的一些不完备的材料，提供一些线索。

关于时限

最常见的说法，“无人区”的制造是在1942年至1943年间，这是不够确切的。据我所知，敌人在长城内外搞集家并村是1940年冬和1941年春，在木兰峪陵园内（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特区）开始的。现在的六合村就是那时由6个自然村集家并村搞成的。据姚依林同志1940年写的关于《冀东游击战争是怎么坚持的》报告中说：“在我部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敌人“企图减少甚至消灭山沟小道中三五户的小村庄，便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增多我游击队活动的困难”。但没有谈及当时实施的具体情况。当然，规模很小，不关大局。至于敌人在长城线上大范围地搞集家并村，究竟是从1941年或1942年算起，也还值得研究。热河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份《西南防特情灭共对策资料——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文件，就是1941年9月形成的。而且，当年我们在热南一带活动

的时候，敌人宣扬集家并村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后来几次到“无人区”访问，一些老同志和当地群众也说敌人在1941年秋后就闹着要集家并村，并且开始大规模烧毁长城线上的村庄，这正是集家并村的前奏。我曾看到过一本残破的《东方》杂志，上面有一篇署名厂民的关于滦平县“无人区”的专题访问记，题名《人圈》，开篇就说：“从1941年，伪满洲国康德八年开始，敌人为了明朗热河，为了防止八路军的积极活动，实行了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不但写明是1941年，而且写明是伪满康德8年，不至于是笔误。

至于敌人制造“无人区”时间的下限，更不是到1943年截止的，而1943年是个高潮，尔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随着我们向东北地区的挺进，敌人不断扩大制造“无人区”的范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血腥的措施才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覆亡而终止。

关于“无人区”的地域范围

据《热河抗日简史》记载：“至1944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峰峦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与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制造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至滦平），南北宽250里（从长城到锦承路北），面积175000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敌驱入人圈。”

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还应该有所补充。

1942年秋冬之际，在热南大搞集家并村的同时，关内敌人也沿长城线内侧大搞“无人区”。

另外，我还曾见到过一份伪蒙军政府宣化省推行集家并村的布告，布告所划定的地域是：“松树岭、请安堡、松树洼、苏

家河、五里坡、下河、×河、关水沟、五于家地、小庄科、降棚山、下棚、上棚、蒋口子、营盘沟、面差山、大融山、小融山、濫角。”

布告限定集家日期是：“自成纪七三八年九月一日起实施，至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这份布告的内容与当年我们在热南活动时见到的日本和伪满机关颁发的集家并村布告如出一辙，其内容与前边引证的日本宪兵队的文件也完全合拍，颇可作为一份佐证。布告所说的“成纪七三八年”，是伪蒙军政府沿用的成吉思汗的纪元，即公元1943年，也正是在热河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的高潮期间。据说由于兵力不足和我方反击没有搞成。另外，据有关的老同志讲，在平北龙关、赤城一带长城线上敌人也搞过集家并村。据说搞得也不彻底，然而，已经可以清楚看出敌人是有着统一部署的，而且范围较大，并且想要与热河一带“无人区”衔接起来，那么这“无人区”封锁带，就远远超过“西至滦平县”的界限了。

关于长城内外敌人之协作

过去一般的说法，都认为制造“无人区”是伪满境内关东军干的。而从当年驻冀东日军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后为——七师团中将团长）的交代材料中得的证实，1942年间在长城线内外两侧大规模制造“无人区”，是关内、关外敌人协同动作搞起来的，而且战略目的也基本一致。据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间，他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四次“强化治安”后冀东的形势时说：“失掉了鲁家峪，对八路军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打击，但丢掉了阵地不等于八路军就是削弱了。阵地被毁掉，他们分散上山了，另外转入地下工作的

力量增强了。这样相反地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当然，像过去那样八路军大活动在表面上是看不见了，所以，在这地区里好像是很白的了，但经深入一下扒层皮，实际上里面是通红的……”基于这种分析，经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一面在冀东基本区大挖“遮断壕”，把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破坏我方基层抗日组织；一方面沿长城线制造“无住地带”。其具体措施不是像关外那样修建“人圈”搞“集家并村”，而是用封锁沟封锁起来，“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交通也要狠狠限制”，制造所谓“真空绝缘地带”。在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下，冀东地区东西部（敌伪分冀东道和燕京道两个建制）敌人协同动作，西起平谷县峪口镇（重点是蓟县盘山地区），与东部遵化、迁安的封锁沟相连接，在长城内侧山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

耐人寻味的是，多年来关内关外的日伪之间在统一指挥下，在军事行动上有过不少的协同动作，但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也是有着很多矛盾的，铃木启久称之为“圈绳定界”之争。诸如马兰峪特区的归属之争，北宁路收益和开滦煤炭分配之争等等。除非有特殊任务经许可，关外敌人是不能随意进入关内活动的；关内敌人则更不能越过长城。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和活动空隙。可是，自1942年制造“无人区”这个战略行动开始，关内关外敌伪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长城内外协同动作，大力围剿，共同制造“无人区”。而且冈村宁次还特别关照，要“与关东军接壤驻地警备部队密切联系实行之”。从此，关内关外敌人的协同动作越来越密切，伪满敌军经常毫无顾忌地进入关内扫荡，对冀热辽地区造成了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

二、彻底的“三光政策”

敌人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对山区根据地推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

杀光：从1942年大规模驱赶群众集家并村，就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对坚持不进“人圈”的人见一个杀一个。当时在日本侵略军中搞杀人比赛。疯狂的敌人进了山区根据地就像追捕猎物一般追逐中国人，杀死后将耳朵割下用铁丝串起来，回去可以按数领赏。从1943年后，屠杀更是步步加紧，就连牲畜、家禽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不放过。在热南山区根据地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都没有了。兴隆县羊羔峪张村长家养着一只小猪，大家都当成稀罕物。这头小猪对当时的战斗环境似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山头一喊哨报警，它就从圈里窜出，乖觉地跟在人的后头跑敌情。

烧光：据不完全统计，热河省在抗战期间被烧毁几千个村庄，房屋382万间。而且这些房屋大部分被重复烧过多次，象我们住过的平谷、兴隆县境内的罗家沟、朱家沟、大小段洼、南北水峪一带，从1941年到日本投降，差不多都已烧过十多次以上，驴儿叫村先后被烧18次之多。敌人为了摧毁我军民赖以隐蔽的山林，每年冬春扫荡时，就到处放火烧毁森林。几年中，长城线上遍山野火烈焰冲天，整个“无人区”成了一片焦土。

抢光：敌人的掠夺更是疯狂到了极点。从开始集家并村起，伴随着杀光、烧光的就是彻底抢光。穷苦山民赖以生存的一点点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可是还不罢手，数年中千百次的扫荡中，依旧是到处搜索抢掠，就连半口破锅、一个空瓶也要被抢走或砸毁。群众藏东西的办法也是巧妙得很，一个瓶、一个罐、一把锄、一张锨，都各有一个正可身的小洞。至于粮食和

衣物，则是随身携带，人在物在。据统计，抗战期间热河省被抢走粮食达96亿斤，牲畜248 000余头。

敌人还有最灭绝人性的一招，就是“割光”。从1943年开始，每年春夏之交，青苗正在茁壮生长之际，敌人就要举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开始由于“经验”不足，割得早，群众又种晚茬，敌人又来割二遍，群众再种些蔓菁、萝卜等，敌人来了还是给割掉。就是要彻底摧毁我军民一切生存条件。

三、人间地狱——人圈

“人圈”，这是群众愤慨的说法，意思是猪有猪圈，羊有羊圈，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人也被圈了起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所以通常都叫“人圈”，其实正名叫“集团部落”。“部落”，是日本封建时代“贱民”聚居的地方，这里又冠以“集团”二字，是“组织”起来加强控制的意思。

生活无着

群众被驱赶进“人圈”，碰到的头一个大困难就是生活失去着落。据统计，兴隆县原有2000多个自然村，被指定的集家部落199个，约10个自然村并成一个部落村。人所共知，山区的特点是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十几个自然村相距几十里的山路。像我们居住过的平谷县罗家沟一带几个自然村，当时被指定的集家地点是陡子峪，相距几十里，隔着几架大山，怎么回去耕种呢！何况家乡已被划定为“大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根本就不许有人迹存在。

在集家过程中，群众住房被烧得片瓦无存，粮食衣物被抢夺一空。可是被赶进“人圈”时，还是要被彻底搜查，随身携带的一点点破烂衣裳和粮食，又被搜掠一空。农民失去了土地，

就意味着失去一切，进了“人圈”后，只能向当地的地主租种一点土地。可是“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种的土地也是极少的，被集家去的群众即使肯出极高额的租金想租得赖以糊口的土地也是极难的事。

非人的居住环境

“人圈”四周是1.5丈左右的高墙，墙顶上是铁丝网或插满枣树刺枝。墙上有垛口，里侧有“马道”，距几十米设一个站台，围墙四角和大门顶上是碉堡。“马道”站台上由群众被迫组织的“义勇奉公队”（即（自卫团）日夜守望着，碉堡和大门由伪军或武装部落警把守着。通常每座“人圈”只留两个大门，门上写着“××部落村”，还有“建设部落，自兴乡土”或“共存共荣，王道乐土”之类的标语。为了防范八路军，夜里经常鸣锣吹号，群众闻得信号，就得立即跑上围墙去跟着呐喊呼叫。白天总是日头升得老高，看看确实“平安无事”，才开门放人去耕作，傍晚太阳未下山就关门戒严了。稍有风吹草动，就几天不开门。可是，在“人圈”内的一般人家是必须“门户开放”的，勒令“夜不闭户”，以便于日伪警特人员横行无阻地去奸淫掠夺。“人圈”内是划定范围由各户自建住房的，一般3丈见方，地势狭窄的地方也有1.5丈或2丈见方的。山里群众被赶进“人圈”后，无依无靠，糊口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又哪有力量建房，多半是搭个马架子窝棚。有不少人家从1942年被赶进“人圈”，直到日本投降，几个寒暑，始终住着原来那个窝棚。冬天，塞上的暴风雪袭来，满屋飞雪，冰冷彻骨。仅兴隆县，几年中冻死群众1000多人。到了夏天，屋里、街上一个样，遍地是泥泞、污水、粪便，臭气熏天。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广泛流行，还有可怕的

败血病，得了病的人鼻口喷血，死亡率极高。据统计仅1943年夏季一次瘟疫流行，兴陵县就死了6000多人。靳杖子村一天就死了40多人。一次可怕的鼠疫流行中，村村死了不少人，大水泉村就死了300人左右。家家陈尸，户户嚎啕，死了人没人往外抬，尸体臭在家里。

敲骨吮髓的经济掠夺

敌人对“人圈”群众的经济掠夺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什么都要，什么都不给”。

“人圈”内实行的伪满洲国的“组合配给”制。群众打下的粮食要交到“组合”，名之曰“谷物出荷”，棉花更是一斤一两也不准存留，叫作“棉花出荷”。此外，还有“大豆出荷”、“油类出荷”、“报国出荷”、“民主出荷”、“部落出荷”等等。捐税更是五花八门，什么门牌捐、户籍捐、牲畜捐、飞机捐等等，数也数不清。另外，还要献储金、献钢铁、献毛皮、血粉、鸡、蛋、菜、杏仁、栗子、核桃等等。“人圈”的群众早已被榨干了汁水，可是捐税依然有增无减。如滦平县玻璃庙村，原有羊3000只，连“人圈”两年间，被伪军警任意屠宰，只剩下11只了，可是征税时，仍然按3000只计算。

群众的劳动所获被全部搜刮干净，就只能靠“配给”物资过活。配给的粮食叫“共合面”，都是豆饼、苦楝子和霉烂的粮食混合磨制成粉。群众私藏一点粮食被搜出，就要当成“经济犯”，甚至以“通敌资匪”的罪名治罪。兴隆六道河子一个人闹了病，弄来点米熬粥吃了，不料在街上呕吐了出来，被伪警看见有米粒，就被抓起来，逼问粮食是哪里来的，受尽了折磨。

按规定每年每人配给10尺布，可是至多给上三四尺，不少地方几年中一尺也没给过，都被官吏、警察、特务层层克扣去

了。而配给到群众手的布料，都是质量极为低劣的人造纤维，下了水一揉搓就破烂了，群众称为“唾沫缎”。我们在那一带活动时，见到“人圈”里群众出来种地，许多人只是身前挂着一条破布或麻袋片；有的成年只有一身破皮袄，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下田时脱在地头上，光着身子干活。一次，部队进入滦平黄土梁子“人圈”，几个战士到一家找水喝，屋里女人惊慌喊叫：“同志，不要进来！”原来屋里两个青年姑嫂，一个光着身子，一个的裤子是穿洞的百衲衣，出不得门。战士们含着热泪脱下自己贴身的衣裳扔进屋去，她们才腼腆地出来招呼子弟兵。象这类的事，在“无人区”活动过的人谁都见过。

在“无人区”里，只有一样物资的供应是充裕的，就是鸦片。各级政府里都设有名曰“禁烟局”实为种烟局的正式行政机构；经济体制中设有“大烟组合”。“无住禁作”的措施，把耕地压缩到人民难以维持生命的程度，可是种植鸦片的面积却逐年扩大，“出荷”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而且规定，不交足“鸦片出荷”，就不配给生活物资。人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独有吸毒不受限制。吸毒、扎毒针泛滥成灾，一般约占成年男子的百分之六七十，女人中吸毒比例数也很大。因吸毒太麻烦也不解瘾，“瘾君子”们大都改成扎毒针，随身携带一支注射器，同你谈不上几句话，他那里就打哈欠流眼泪犯了瘾，弄个酒盅，冲开点鸦片水，隔着破肮脏的破裤子就扎了进去。扎得浑身结成大大小小的硬疙瘩，遍体烂疮；扎到无处下针的程度，也就毒死、瘾死了。

血腥的“大检举”

敌人对“人圈”中的群众更是像猪羊一般地任意宰割。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泄密犯，通匪、济匪、资匪等等

数不清的罪名，可以随意加在任何人的头上。搜出几个信封，就被加上通匪罪；读四书也会被加上“思想犯”的罪名；说上一句：“我是中国人，”就会被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治以重罪。其实也不须有什么罪名，在侵略者心目中，中华民族的存在，中国人的生存就是弥天大罪，兽性发作就可以任意宰割。连年累月一次又一次的“大检举”（即大搜捕），每次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被逮捕和屠杀。每年不知要抓多少次劳工，大批青壮年被抓走，有的发配到北满或日本去服苦役；也有的被秘密送到细菌战研究所或武器试验场去当试验品，或者被弄到日本军队中做对新兵进行“胆量教练”的活人靶。“大检举”中集体屠杀的血案更是层出不穷，兴隆县秋木林子和大莫峪两村共有130户人家，一次就被杀了男人180人。像这样的“寡妇村”在“无人区”是很多的。承德监狱是残害中国人的一座大魔窟。在那里，像灌凉水、压杠子已经是“一般化”的刑罚了，什么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拔神经等酷刑就有十多种。1945年夏季，一次搞电刑试验，就杀死300多人。据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就有37690人死在这座监狱中。承德市西郊的水泉沟，就是最大的屠杀场和万人坑。几年中，总有几百头野狗聚在那里扒尸吃。都吃红了眼，行人谁也不敢接近，伪军警去埋尸时都得先鸣枪驱赶狗群。

兴隆县是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1933年3月被日军占领时，总人口约14万，到1945年日本投降，近12年半的时间，如果按旧时代和平时期正常人口增殖率计算，总人口约可达十八九万。可是，在这12年中，特别是制造成“无人区”后的几年过程中，全县被屠杀三万四千多人。死于冻饿和疫病万余人。再加上极度困苦的生活，绝大多数妇女失去生育能力。到日本投降时，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不足

10万。日本法西斯制造“无人区”，就是要我们种族绝灭。

热河日本宪兵司令官长岛玉次郎，就是制造“无人区”的主要刽子手之一，连日本人见了他都象见了毒蛇一样毛骨悚然，称他为“魔鬼中的魔鬼”。可是，由于他统治手段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得力”，制造无人区“有功”，曾受到褒奖，得了勋章，并且把他的“经验”在整个伪满洲国宪、警、特系统中推广之。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伪满热河省的坚壁清野

春 风

我堕身于伪满13年，在热河省竟达10年。前7年职位是在省公署，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古寺古物、学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后3年任热河省隆化县县长，直到解放。

一、伪满坚壁清野的开端

伪满的坚壁清野政策，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施行的，其实来源于通化。由于通化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有爱国志士杨靖宇、邓铁梅等义勇军，风起云涌，愈来愈盛。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一时计穷智竭，莫可如何。适有通化省警务所长岸谷隆一郎（后任通化省次长），是一个“满洲通”（会说中国话，对满州事情比较熟悉）。鬼计多端，具有一副假仁义真狠恶的心肠。他一方面组织警察讨伐队，进行讨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悬赏缉捕，终把杨靖宇部下的叛徒程斌捉